

晚唐文学变局中的

「温李新声」研究

刘青海 著

中华书局

晚唐文学变局中的「温李新声」研究

刘青海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唐文学变局中的“温李新声”研究/刘青海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8.7

ISBN 978-7-101-13312-7

I. 晚… II. 刘…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晚唐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4949 号

书 名 晚唐文学变局中的“温李新声”研究

著 者 刘青海

责任编辑 李碧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312-7

定 价 66.00 元

序

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向来有正变之分。用正变来把握文学及其发展,是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的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它的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汉儒传诗的正变之说,《毛诗大序》是这种学说的集大成,也可以说是后来文学正变之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此后魏晋文学重在风雅正声的继承,而南朝文学则变局诡生,其时如沈约、萧子显等人论文,都重视文学之变,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文体三变”之说,颇为后世文学史家沿承。刘勰遵守正轨,重视传统,但是他在研究具体的文体、文风时,对于源流演变最为关注,为后人研究文学史演变提供了许多模式。齐梁文学一直在新变的道路上发展,却被批评轻险淫放。于是人们对变的实践方式与理论观点产生严重的质疑。初盛复古诸家,又多以继承为重,超越齐梁,重接汉魏传统,并且一直追溯到《国风》《大雅》,以为文学的“宪章”。李白《古风》其一就是这种文学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唐以后,诗文复古的呼声一直存在,甚至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都比盛唐时期有所加强;但相对于盛唐正宗,其变化的一面是最为主要的。这其中又可分为两层:前期文学中,大历诸家继承从沈宋到王孟声律风骨并重的诗学正宗,但经安史乱后,风骨渐衰,物色渐重,并且在趣味格局上又不知不觉地靠近齐梁的前轨,这就是学术界热衷于讨论的“大历诗风”;但是,重古意的作法也一直是存在的,如刘长卿、韦应物两家,都有这方面的表现。元结则不惜牺牲文人诗在

风格美学上数百年积累的成果,想重新制作古老的风雅,可以说是复古中最为激进的一派。元白正是对元结的策略加以调整之后形成其新乐府的理论并付诸实践的。另一方面,从文的方面来看,真正的复古却似乎是刚刚开始,李华、梁肃等人的实践,引出了韩柳的古文。但这中间的传承推进环节,还没有很好地被勾勒出来。这样看来,中唐相对盛唐,大体上可以说是承中之变。

本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就是在研究晚唐文学之变的时候,将探讨的前端追溯到对上述中唐“承中之变”轨迹的寻找。如其中对李商隐古文道路的研究,以其“处士叔”为主要线索,寻找义山早年古文创作的具体背景,得出结论说:“在李商隐早年所处的中晚唐之际,虽然文坛上没有再出现能与韩柳比肩的新一代古文大家,但中唐以来古文写作的风气还是在以某种方式延续着。”这一结论看似平常,却是建立在一个很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的。又如对于词史早期人物王涯,作者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认为“从德宗贞元(785—805)、宪宗元和(806—820)到文宗大和(827—835)这前后五十年间,实为文人填词的重要时期”。至于对长吉体直接影响温李新声这个环节的梳理,也是本书相对前人研究掘进更深的课题之一。从这些方面来看,本书虽然以晚唐文学变局为研究对象,但在很多方面,都由“温李新声”这个概念出发,探寻其与中唐甚至盛唐文学的关系。不仅如此,作者对晚唐文学与中唐以前文学的关系,也有所探寻。如在讨论樊南四六文的时候,深刻地感到徐庾骈文的胜境以及温、李在艺术上对他们的心摹手追。这个环节,前人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但确实还是钩沉得不够。当然,这样的课题,以后还有不断研究、推进的空间。

本书的核心论题,是晚唐文学变局中的温李新声。晚唐文学之变,在传统的评价上,比中唐文学又下一阶。从宋代庆历诸家开始,就将晚唐五代文学作为一种带有反面性的参照对象来观照,至元祐诸家,几成定论。黄庭坚就说:“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

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与赵伯充书》)此后历代学者,在论晚唐文学之变的时候,也都强调其衰变的事实。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黄庭坚本人,论者就曾指出他学习李商隐、唐彦谦的事实。王安石更是从晚唐绝句的结构精致、新意独绝入手,形成荆公绝句独特的风格,为黄庭坚所欣赏,并给诚斋活法绝句以很大的启发。诚斋更是“拈着唐诗废晚餐”(《读笠泽丛书》),这里说的也是中晚唐绝句,而非盛唐绝句。更往后面,情形变化得更加出人意料,永嘉四灵这样几位处于下层的诗人,因专宗晚唐而风行海内,形成江湖诗派。这种情形,似乎是晚唐苦吟诗派的重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晚唐的诗文,虽然传统的看法认为是一种衰变,但是从美学价值来看,又创造了许多新的意境,甚至是新的诗学法则。作者此书中着重研究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这几位晚唐作家,在中晚唐的文学流变中,是属于能够自立的大家、名家之流。尤其是“小李杜”,文学理想与格局都比较宏大高远,初一看都是不为晚唐文学一般的格局所限,但他们也都是在晚唐整个文学风气中存在的。他们在文学上对时风及流行之体的超越又是怎样达到的呢?换句话说,晚唐诗文创作中仍然出现大家,并且在文体、文风、文法上相对于前几期都有推进,这样的文学事实应该怎样去认识呢?本书通过对温、李等家文学之渊源流变的梳理,部分地回答了上述问题。比如对李商隐对中唐韩柳文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作者另一部专著《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对李商隐诗学本体论言志与缘情、自然元气与人工造极之关系的分析,能够解释其作为晚唐卓然独立的大家的部分成因。又如本书通过对温庭筠先是刻意学习长吉之法作乐府,并受李白古乐府创作方法的影响,写作大批“倚声乐府”,希望能够重现南朝之美;但最后真正绚丽的花朵却在作为新声乐府的词体创作上。这一梳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推进。

晚唐文学之变,与许多时期的文学之变一样,从当时的立场来

看,其实就是古今之变。诗体方面的古近体之消长,文章方面的古文与骈文的消长,以及作者用心梳理出来的古乐府与词体的承变与消长,这几个核心的问题,都涉及到“古今之变”。本书虽然将这个视野铺展到全局,但在温、李一派中这些脉络已经呈现得比较清楚了。当然,研究晚唐文学,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唐宋变革论”。作者也曾试图引入这一把握方式,但最后还是更多从历来关注较浅的文体方面入手来解释何为“温李新声”。这也未始不是一种侧重。因为作者所重视的,在于文学本身。至于谈诗论文的细腻独到、心思绵密,更能见其治学行文之特长。这都缘其对艺事本身的热爱。我认为这是研究文学者的基本素质。同样,在文献与引证方面,对于前贤时秀也有充分的尊重。

当年元好问提出“温李新声”这个说法,其实是在一个很大的文学史时段中思考问题的,尤其是有关文学上的南北问题。正如本书“温李诗歌中的南朝主题”一章所展示,温李是以北人身份而醉心南朝文艺、人物。这正是元遗山似讥似赞的意趣所在。其实不仅温、李,王维、杜甫何尝不是如此。李白虽是南人,却自称北凉武昭王之裔,其对于吴越之地的情结之深,更是深刻地影响到他的人生与文学。本书对于这些话题,其实都有所触及。但这无疑都是一些还可充分展开的领域。我们也期待作者对于晚唐文学变局、对于温李新声有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期待学术界的同仁对本书中提出的一些思路、问题与结论的共同关注。

文学正变之说虽是传统研究方法,但进入现代学术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何将其臻于史学与美学并重的一种文学史研究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科学方法,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书无疑是这方面的一个有意义的实践。

戊戌夏初,东嘉钱志熙序于沪上枕河居

目 录

序	1
绪论:晚唐文学的变局	1
一、骈体的复兴与古文的衰落	5
二、古体与近体的消长	10
三、词体的兴起	15
四、本书简介	23

上编:古文和骈文

第一章 李商隐创作从古文到骈文的转变	31
第一节 李商隐早年学习古文的经历	31
第二节 李商隐对韩愈文道论的承与变	36
第三节 李商隐对元结文道思想的汲取	42
第四节 李商隐从古文到今体的转向	52
第五节 李商隐对今体和古文的复杂心态	56
第二章 李商隐的骈文理论与创作实践	62
第一节 “四六”名义源流考	
——以晚唐五代两宋为中心	63

一、“四六”概念的提出	64
二、“四六”与“应用”	69
三、晚唐五代以“四六”名集的情况	75
四、两宋以“四六”名集的情况	81
五、两宋的“四六”选及“四六”批评	85
第二节 “四六”形式的流变与李商隐的“四六”观	90
第三节 李商隐有关“好对切事”的论述与实践	107
一、李商隐“好对切事”论的内涵	107
二、李商隐四六对徐庾和四杰的取法	111
三、李商隐四六的对仗艺术	117
四、李商隐四六的隶事艺术	129
第四节 李商隐四六以散济骈的艺术倾向	135
第三章 温庭筠的骈文创作	151
第一节 “三十六”名义源流考	151
第二节 温庭筠启与李商隐状的比较	155
第三节 后期“惟以哀矜为主”的风格特征	163
第四节 温庭筠四六的对仗和用典	168

中编：古体和近体

第一章 温李诸人学长吉体及其得失	179
第一节 李贺在中晚唐之际诗坛上的定位	179
第二节 温李学长吉体的得失	195
一、温庭筠学长吉体的得失	196
二、李商隐学长吉体的得失	207

第二章 杜牧冶游七绝研究	217
第一节 晚唐绮艳风尚背景下杜牧冶游七绝的独特个性	218
第二节 杜牧早年的浪迹生活与冶游七绝“风流自赏”的特质	222
第三节 杜牧冶游七绝的寄托性质与对六朝风流的向慕	226
第三章 李商隐艳情诗研究	234
第一节 “艳”体溯源	235
一、大曲之“艳”	235
二、“荆艳”之“艳”	243
三、从“艳歌”到“艳诗”	249
第二节 李商隐艳情诗的风格类型	253
第三节 李商隐无题诗的艺术特质	262
一、爱情主题的表现:从代言体到个人化抒写	262
二、先有诗而后有题的“本乎情”之作	268
第四章 温李诗歌中的南朝主题	271
第一节 初盛唐诗歌中对“南朝”的追慕与想象	272
第二节 安史乱后咏史怀古诗中的南朝主题	275
第三节 李商隐诗歌中南朝主题的三个面向	282
第四节 温庭筠诗歌中的南朝主题	289
第五节 杜牧诗歌中的南朝主题	293

下编:乐府和词

第一章 温庭筠乐府诗的艺术渊源	301
第一节 温庭筠乐府与六朝乐府的渊源关系	302

第二节 温庭筠乐府的比兴引喻和双关手法	335
第三节 温庭筠乐府对太白的取法	341
第二章 温庭筠乐府与词的关系	344
第一节 温庭筠乐府与温词的浮艳风格	344
第二节 中晚唐浮艳风格在乐府体的渊源与发展	354
第三章 温庭筠风花词研究	361
第一节 “风花词”概念的提出和内涵	364
第二节 柔媚温丽的词风	368
第三节 风花词的浮艳风格与“风人体”	379
结 语	387
参考书目	390
跋	407

绪论：晚唐文学的变局

“温李新声”一词，首见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三：“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①元氏此论，涉及南北文学的问题。西晋文学源于汉魏，属于北派的文学。张华也是北人，然钟嵘引时人之论，认为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②。言下之意，是说北方文学家中原本也有纤柔丽靡一派，张华不为已甚。至唐诗，虽盛唐高扬汉魏，以风骨为重，但中晚唐齐梁之风又有所复归，至温、李等家，虽为北方文学家，却是多承南朝之风，作为新声，其绮丽纤柔，又过于张华矣。由此看来，元氏此论，实有关于南北文学及中晚唐文学变局的大势。元好问是北人，崇尚刚健的河朔文风，故对于“温李新声”持鲜明的批评态度。元氏“温李新声”，主要指的是温李所代表的绮丽诗风。本书借用来概括温李代表的文学风格，认为温李无论诗、文、词，相对于前期文学，都表现出鲜明的新变特征。

①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十一，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上册，第268页。

②钟嵘：《诗品》卷中“晋司空张华”条，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上册，第11页。

“温李新声”是晚唐文学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中晚唐文学的新变,是一个连续并且起伏的过程。我们要明晰晚唐文学之变,势必要将晚唐文学作为中晚唐文学的重要一环,来探讨其变化的起因、趋势和具体表现。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②,历代皆然。唐诗至开元、天宝而极盛,盛极而求变,此自然之理也。安史乱后的中唐前期诗坛,一方面是元结、孟云卿等人,继续高举盛唐的复古旗帜,倡言讽喻兴寄;另一方面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诗人,由于社会生活和审美心理的巨变,创作中普遍弥漫感伤、怀古的情调,艺术上趋向于精致、细腻、绮丽,有重新回归齐梁的倾向,相对于盛唐诗风,予人以“神情未远,气骨顿衰”^③的印象。上述两个方面,无疑是以后者为主流的。文学史上的“大历诗风”,也主要指后者而言。大历之后,有识之士思变革以求中兴,故贞元、元和之际,韩柳振起,倡导明道之文;元白又标举新乐府,以求革除弊政,以诗救时。二者虽取径不同,而以文学干时则一。从诗史发展的脉络来说,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与元结、孟云卿一派诗学主张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他们所要取法和超越的,则是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风;而以“十才子”为代表的大历诗风,从诗学源流来讲,基本属于王维这一派,故不在

①诗分四唐,源出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第二十卷正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1页),本为描叙唐诗之“正变”,以“晚唐”为“元和以后之诗”。稍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近体律诗》则提出“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两说不同。愚以为甘露之变是中晚唐政治变局的一大关键,故从徐师曾说,以文宗开成初作为中晚唐之界划。黄节《诗学》讲义中,明确“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黄节诗学诗律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页),亦宗此说。

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671页。

③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1页。

其视野之内。中唐后期诗人欲在李杜之后有所树立,欲在盛唐之后有所开辟,故普遍具有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正是对此种普遍的创作倾向和诗学实践的概括。无论元白之平易,刘禹锡之豪,韩愈之险,李贺之奇,皆各有开辟,且自成一家。故元人袁桷云:“诗至于中唐,变之始也。”^①这里的“中唐”,所指实为中唐后期诗坛。叶燮《百家唐诗序》复阐论云:“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是何也?……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②近年来,学者对于叶燮“百代之中”说的研究硕果累累^③,叶氏此说已基本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与此同时,中唐之文也出现了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韩柳以明道为宗旨,鲜明地倡导古文,由此造成骈文与古文互分疆界,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千余年文体的格局。尽管晚唐骈文卷土重来,但骈文因古文的出现,其内涵和外延都逐渐发生变化,其抒写情志的功能日益减弱,逐渐沦为一种应用性文体。故历来文学史家,皆视中唐文学为古今文学之一大变,并以此为探讨唐代文学之变的重点。

晚唐朝政日非,士风也随之颓坏,像李商隐这样仍存中兴之念的士人屈指可数。随着韩愈的离世,古文运动逐渐消歇,骈文随之复兴,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皆以善骈体文而为当时人所艳称。当然,古文也没有完全退出文坛,并且以一种隐在的方式发生影

①袁桷:《书汤西楼诗后》,《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丛书集成续编》本,第813页。

②叶燮:《已畦集》卷八,长沙叶氏梦篆楼刻本。

③已经出现专著如蒋寅:《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响。中晚唐古文与骈文的消长,不完全是文体内部的问题,外在政治环境的恶化和士风的颓坏,导致传统文道论的衰落,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点学界似乎注意得还不够。故与此同时,重视比兴和寄托的古体诗创作也大幅萎缩,而流连光景的近体诗写作则大昌,并且与中唐诗学构成错综复杂的流变关系。晚唐诗风整体上平浅、靡丽的风格,深受元白轻艳诗风的影响。但像李商隐、温庭筠这样有成就的诗人都甚取法元白,而是更多地由韩孟诗派(包括李贺)而上溯盛唐李杜乃至风骚传统,虽然古近体兼善,但其主要的成就和影响还在骈体文和近体诗,其诗文与齐梁文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贾岛、姚合一派固守传统文道论并坚持写作古体,属于韩孟、元白重寄兴、尚风骨的复古诗学这一脉;艺术上又以苦吟为尚,显然更多地受到韩孟诗派的影响。要之,晚唐古体和近体的消长,与古文和骈文的消长,二者几乎同步,这是晚唐文学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温李皆以骈文和近体见长,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变化。而自言“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①的杜牧,其诗歌仍旧是以近体为主的,也受到这一大趋势的牢笼。

此外,齐梁体的复兴,诗客曲子词的兴盛,也构成晚唐文学之变的另一重要方面。以温韦为代表的花间词派的婉约风格,对北宋初期整体的词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要之,晚唐文学变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突出表现为古文衰落、骈体兴起,近体盛而古体衰,古乐府歌行稍歇而词体兴起,都涉及到古今体的问题。

^①董浩编:《全唐文》卷七五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册,第3456页。

一、骈体的复兴与古文的衰落

句有骈、散,为诗文中一种自然的状态,本无关乎文体。自汉魏以来,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兴起,文人的创作越来越重视声律、对偶和词藻,诗文中骈的成分也日益增多,甚至有一篇之中全为骈偶的。诗、文不同体,但在追求骈偶这一方面,两体趋向一致。刘师培论云:“建安以还,文崇偶体;西晋以降,由简趋繁。”^①也是兼诗文而言之。不过,和诗歌相比,文章对于骈偶的追求似乎更早,并且很早就实现了篇体的骈化。以陆机为例,其《豪士赋序》《文赋》已通篇皆骈,钱锺书所谓“搜对索耦,竟体完善”^②;陆机诗歌亦以“体近雕刻”^③称,但仍为骈散杂出之体,至稍后谢灵运《登池上楼》才“彻首尾成对句矣”^④。为什么诗的骈化较迟于文?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缘故,乃是因为五言诗本出于以散体为主的乐府歌辞。诗歌创作受到传统的影响,故骈化相对迟滞,而文则无此阻碍。文章之骈,赋之一体成熟最早,之后渐及于表疏等文体。盖文章以实用为主,篇幅较长,要实现全篇皆骈,不但需要作者有足够的文学技巧,还需要统治者的上层(同时也是章表奏记和制诰敕策的发布者和受众)有这方面的审美需求,二者缺一不可。自曹魏以来,尚文之主不绝,齐梁以来对于声

①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撰、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②钱锺书:《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光华大学半月刊》,1933年4月。

③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④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评》第14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律、对偶的追求,更给骈文的写作和流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故开启“骈文极盛时代”^①,至徐庾而臻顶峰,良有以也。此为唐以前诗文中骈偶发展之大略。

初唐沿陈隋之旧,以骈俪为尚,诗文皆然,故四杰得以雄视,而上官仪有六对、八对之说。至陈子昂倡言复古,李白、杜甫、王维等群起响应,方有意识地解对为散^②,而以三代两汉之文为法。诗歌方面,就骈的程度来说,杜甫主骈,太白以散,而王维得其中,而皆为盛唐大家,可以说骈和散的关系,在经历矛盾运动之后,已经实现了新的融合,足为后代之法式。而文章的情况则不同,初唐文章沿陈隋之体,“太宗本好轻艳之文,首用瀛洲学士,参与密勿,论诰之言,咸尚俪偶”^③。即便是以诗风自然疏野见称的王绩,其日常书信如《答刺史杜之松书》也是流行的骈体。初唐四杰的骈文,颇效六朝小赋,“每以五七言相杂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远俗”^④。盛唐之文,“燕许大手笔”以骈文独领风骚,然诸家之文,用典减少,散句增多,这和盛唐诗歌在风格上的追求趋向一致。中唐之初,骈文内部其实已经孕育着变化,“出现了实用性增强和艺术特征消退的趋势”^⑤。最典型的如陆贽之文,在骈四俪六的形式之外,“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⑥,故受到唐宋古文家如权德舆、苏轼的推崇。韩愈提倡古文服务于儒道,但并不一律

①陈柱《中国散文史》序:“骈文极盛之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②钱志熙《论初盛唐时期古体诗体制的发展》(《南开学报》2011年第5期)有深入详尽的论述,可参看。

③谢无量:《骈文指南》第二章第四节“唐骈文”,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第53页。

④许梈:《六朝文絮》卷一评庾信《春赋》语,上海:东方书局,1935年,第10页。

⑤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

⑥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陆宣公集》,《曾国藩全集(修订版)》,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5册,第303页。